

從皇國少年到左傾青年： 台灣戰後初期（1945～1949）葉石濤的 小說創作與思想轉折

陳建忠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台灣作家葉石濤（1925～）個案的探討，讓我們得以觀察一個曾經被殖民化的心靈（皇國少年），如何在與殖民主義纏鬥的過程中，歷經馴服與反省，最終將這些資源轉化為追求主體性的動力。本文試圖從他戰後初期的小說創作與思想轉折，來論述此一艱困的過程。

綜觀葉氏戰後初期作品，可大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台灣當代現實為背景的現實主義小說。左翼青年葉石濤所採取的描述台灣社會階級矛盾的視角，終於使他走出西川滿影響下個人性的浪漫抒情主義，走向社會性的浪漫英雄主義，一種「再解放」的革命史觀。另一類作品，則是以四百年來台灣歷史事件為背景的歷史題材小說，葉石濤在日據下雖通曉台灣史卻依然不能為他帶來對殖民主義的批判視野，一旦這種史實被「覺醒」後的葉重新運用，則以他遂早熟的技巧（殖民遺產）完成了這些台灣歷史題材小說。

文化與國家意識的「混雜」（hybridity），最後造就出葉石濤這樣的心靈狀態與認同取向。一個「學舌」（mimicry）的殖民地之子在歷史的戲弄下，艱困地蛻變出一個新的民族自我，葉石濤的文學與思想所呈現的正是這殖民史上難遇之島史的曲折經驗。

關鍵詞：皇民化運動 後殖民 葉石濤 主體性 戰後初期

**From an Imperial Adolescent to a
Left-Wing Young Man:
on Yeh Shih-t'ao's Fiction Writing and
Thinking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Post-WWII (1945-1949) In Taiwan**

Cheng-Chung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rough the study of Yeh's case, we are able to observe how a colonized mind (as an Imperial Adolescent), in struggling against colonialism and in experiencing the stages of yielding and rethinking, eventually transformed these processes into a pursuit of his own subjectivity.

In examining Yeh's works during the early Post-WWII period as a whole, we divided them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of them is Realist novels that deal with Taiwan's contemporary reality. Yeh, a Left-Wing young man, started from "personal" Romanticis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ishikawa Mitsuru and transformed into "social" Heroic Romanticism that is a kind of "re-liberalized" revolutionary historic view. The other is historical novels which deal with Taiwan's historic events in the past 400 years. Yeh employs his premature writing skills (his colonial legacy) to finish these historic novels.

At last, the “hybridity” of culture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ccomplishes Yeh’s state of mind and orientation of identity. Under the twist of history, a “tongue learner” (mimicry) and at the same time a colonial son transforms difficultly into a national self. Yeh’s case represents a rare historic experience of a colonial island in the colonial history.

KEY WORDS : the Kominka Movement post-colonial Yeh Shih-t’ ao
subjectivity the Early Period of Post-WWII (1945-1949)

從皇國少年到左傾青年：

台灣戰後初期（1945～1949）葉石濤的 小說創作與思想轉折

一、前言

將台灣「戰後初期」(early post- WWII period, 1945～1949) 視為一個重要的研究範疇，對筆者而言，首先是一個「文學史」問題，這是理解日據台灣文學發展如何過渡至國府統治時期文學發展的關鍵時期。一般論述大多將戰後初期文學簡單帶過，而較少深究文學與文化層面的過渡時期問題。事實上，如果從整體四〇年代文學的角度來看，戰後初期文學與四〇年代前期的台灣戰爭期文學密切相關，也與五〇年代文學（特別是本土左翼傳統的消亡）的變化不可兩分。換言之，戰後初期乃是日本大和文化與國府中國文化「重疊」(overlap)的一段時間，不能輕易將之遺忘、收編，而應該將其重要性重新評估。

另一方面，戰後初期所涉及的問題又攸關「後殖民議題」(post-colonial issues)。對台灣研究者而言，從事文學研究常無法不將作者與作品置入殖民與後殖民脈絡中思考。然而，後殖民文學與文化的變化應該是多重而複雜的現象，不能由非殖民國家的文學或認同觀點來衡量（如西方的帝國主義或中國的次殖民地經驗）。換言之，我認為應該發展出一套台灣的「後殖民閱讀策略」(post-colonial reading strategies)，藉以解讀台灣作家因應殖民主而發展出來的思考與美學形態。簡單來說，殖民者也許能夠主導文學文化發展，但被殖民者也同樣在從事各種形式的抗拒、對話與創造。就此而言，台灣文學雖受日本殖民影響，也受國府統治影響，但在殖民統治之外，台灣文學作家也極力發展出

屬於台灣文學獨特的面貌，其中甚至不乏吸取來自日本或中國的文學養分，對於台灣作家如何進行「後殖民實踐」(post-colonial practices)，誠然有待更進一步詮釋的必要。

二次大戰後，後殖民台灣所面對的兩個統治者，其差異在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經由五十年殖民教化與台灣人產生複雜關係，而國民黨政權則依賴「祖國情感」和台灣人糾合一起。與其說在戰後曾出現「反國府」的情況是一種奴化或殖民化，更應該思考的是，台灣人是如何受到時代的擠壓而形塑出特殊的思想面貌？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中，葉石濤（1925~）雖深受在台灣的日本浪漫主義作家西川滿（Nishikawa Mitsuru，1908~1999）影響，但也在接受浪漫主義文學洗禮後，在戰後將之轉化為對台灣現實的關切。弔詭的是，這種轉變與殖民主義（文學）的介入實則密不可分。

本文試圖提出的看法其重點在於：台灣作家的被殖民經驗是多樣化的，必須個別、深入地加以解析。葉石濤個案的探討，乃是筆者一系列戰後初期文藝研究的關注之一¹。而葉氏的重要性在於，讓我們得以觀察一個曾經被殖民化的心靈，如何在與殖民主義纏鬥的過程中，歷經馴服與反省，最終將這些資源轉化為追求主體性的動力。要詮釋這種轉變，不能僅由中國民族主義或台灣民族主義觀點來評價（葉的轉變並非僅朝向非殖民化或獨立化），更必須注意到，被殖民者複雜的主體認識與建構過程的特殊性，這是葉石濤個案置於台灣文學史中，乃至台灣精神史中饒富深意之處。

借用《葉石濤評傳》作者彭瑞金的提問，可以相當程度切近本文的部分主旨，那就是如何看待「殖民經驗」在後殖民時期的定位問題。他問道：

令人不解的是，生長於斯的四〇年代台灣知識份子、作家，為什麼必然具備「尖銳的反抗意識」呢？他們不是生下來便是「日本臣民」嗎？他們為什麼要背負那實際並不存在，也不該由他們背負的「中華民族意識」

¹ 從 1998 年的〈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小說的歷史考察〉（後收入《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陳義芝編，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 12 月）開始，迄今筆者已陸續完成數篇戰後初期研究的論文，刻正結集中。又，下文中亦會於舉證時陸續提及相關論文，於此不贅。

呢？只要他們不曾積極、主動地做過危害台灣人民的行為，他們有什麼需要慚愧、自責的呢？²

問題或許較諸葉應該歸屬於何種民族主義認同更複雜。如果說，葉石濤比起當時其他歷經兩個時代的台灣作家有何不同之處，應該是他不僅從日據末期活躍到戰後初期，更是七〇年代以降，台灣文學本土化論述興起的主要意見領袖³。他的影響力是更全面性的，固不僅在於創作與延續文學傳統而已。然而正因如此，他所受到的無論褒或貶的「特別待遇」，容易使我們以為那是葉石濤的個別問題，而忽略某種程度來說，他所反映的乃是某一類台灣知識分子普遍類近的心路歷程。

換言之，葉石濤由接受殖民教育教養長成的皇國少年（an Imperial adolescent）轉化為左翼青年（a Left-wing young man），再蛻變為台灣本土論者（a Taiwan nativist），是可以提供我們思索一個世代（或更多）知識分子的文學與思想問題的。我們需要追問的是：葉石濤的轉變所涉及的契機為何？日本與中國文化交疊在他身上，他又是如何去安頓其意義，從而轉化為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內涵？如此一來，不回溯到關鍵的戰後初期四年，恐怕無法周延且合理地解答上述提問。

二、變相前的真相：葉石濤文學與思想發展的前史（pre-history）⁴

在進入正題之前，對於葉石濤如何走入日據時期台灣文壇的過程，似乎是需要先行解決的問題。而他又如何繼續走入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壇，則是另一個有待考察的重要背景。因為唯有對照前後時期葉石濤的變化，方能了解他「變

² 彭瑞金，《葉石濤評傳》（高雄：春暉出版社，1999年1月），頁109。

³ 葉石濤撰寫於1980年代中晚期的《台灣文學史綱》，在台灣文學研究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⁴ 此處之所以將葉石濤的日據時期活動稱為「前史」（pre-history），隱含有「非正式歷史」（unofficial history）的意味，想指出他尚未進入生命中的「正史」（historiography）階段，尚未有「自我認證的歷史」（authorized history）。後文中將提及，少年葉石濤雖然「知道」台灣歷史，但台灣歷史卻「不屬於」他，他的創作便顯示如此歷程。因而充其量那只能像馬克思（K. Marx）所說的，在人類尚未有真正的「自由」前，其實還處於「前史」的階段，是受到國家、帝國主義壓制的階段。

相」的癥結所在，所謂創作與思想的「轉折」如何發生。

葉石濤的文學創作開始於戰爭時期的一九四〇年代。一九四三年，西川滿主持的《文藝台灣》上刊出他的日文小說〈林君寄來的信〉（〈林からの手紙〉）與〈春怨——獻給恩師〉兩篇小說⁵，其時他剛自台南州立二中畢業未久，尚未滿十八歲。隨後，他便北上島都擔任西川滿的編輯助手，這段經歷日後葉石濤常以師生關係自許。當時發表的兩篇小說分別是：〈林君寄來的信〉描寫主角葉柳村受邀前往台南拜訪好友林文顯，重點在於農村氣息與愛慕友人妹妹春娘之淡淡情愫；〈春怨——獻給恩師〉則寫「我」陪同著有小說〈雲林記〉的詩人西村先生與表姊春英，一同前往雲林訪友，重點在「我」與春英曖昧、微妙的感情糾葛，而以法國作家紀德的《窄門》中的話語做為全篇註腳。

關於葉石濤日據末期的小說創作與文學觀，林瑞明的研究曾指出，由於受到西川滿浪漫主義文學的薰染，葉的早期小說有著「戰爭的無視化」的特色，並且可看出受到法國小說及日本「新感覺派」美學的影響，有著「私小說」的傾向⁶。不過林瑞明認為葉石濤無視於戰爭存在，「側面表現出他並非太平洋戰爭中的皇民少年，相較於同時代的少年，沉迷於法國文學、舊俄文學，反倒使他免疫於皇民教育的影響，他內心裡有著更廣闊的世界」⁷，這或許稍稍過度詮釋了「皇民化運動」（the Kominka Movement）下葉石濤的自主性。究其實，我認為少年葉石濤也許對台灣農村與風習並不排斥，但小說的主題並非「刻意」遠離戰爭影響，而是少年強說愁的自然衝動與美學傾向使然。也因此，台灣農村在殖民地下的現實困境，遂無法在左翼思想尚未成熟起來的少年心中得到正視。

⁵ 〈林君寄來的信〉刊於《文藝台灣》5卷6號，1943年4月，〈春怨〉刊於《文藝台灣》6卷3號，1943年7月。兩篇小說中譯可見彭瑞金編的《葉石濤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7月。另外，尚有更早的作品，如投稿張文環主編之《台灣文學》被選為佳作但未刊出的〈媽祖祭〉；及投稿《文藝台灣》未獲刊登之〈征台譚〉。這兩篇作品當中的「媽祖祭典」與「歷史題材」等元素，似乎顯示了少年葉石濤的某些美學傾向，會在日後進一步發展（詳下文）。

⁶ 林瑞明，〈葉石濤早期小說之探討〉，《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6年7月），頁333-337。

⁷ 同上註，頁340。

以上的詮釋關係到我們理解葉石濤的思想轉變過程。因為，少年葉石濤雖然並不缺乏對農村與習俗的認識，但他顯然在戰爭期尚未能站在台灣無產階級與主體性歷史的角度去創作。雖然葉石濤曾坦然自陳地：「他（案：指西川滿）是日本浪漫主義，我是台灣浪漫主義，主題性有差」⁸，但當年的美學傾向與品味卻與西川滿相當雷同：

可見我在那時候根本沒注意到文學的社會性功用的一個層面，也不知道文學的時代性使命。我真是個不可理喻的藝術至上主義者，我喜歡唯美的東西勝於「文以載道」⁹。

而事實上，在另一方面，皇國少年葉石濤除了唯美、抒情的風格外，其實也不乏呼應時局之舉，而非全然無視戰爭存在。就像西川滿兼具浪漫主義作家與殖民地文壇主導者身分，葉石濤顯然也同時具備文藝少年與皇國少年的身分認同。因為就在葉石濤在台北襄助西川滿，開始文壇生涯的同時，他也涉入了當時展開的「糞現實主義論爭」（糞リアリズム論爭）。

日本殖民後，台灣作家因應殖民地現實所發展出來的現實主義文學思潮，所具有的反殖民性格當然無庸置疑，然而，也正因為「寫實」本身必然還觸及到「觀點」的問題，對於台灣作家的現實主義作品，日方加以嚴厲的批判與防堵，似乎就不難想像。戰爭時期的四〇年代，台灣文學史上著名的「糞現實主義論爭」，便是殖民主義文學與現實主義文學的一次交鋒。

提及「糞現實主義論爭」，其實還應該注意到這是戰爭期所謂「文學史論爭」的一個再擴大。因為早於「糞現實主義論爭」，一九四〇至四一年間，台北帝大文學講師島田謹二便曾提出「外地文學論」，當中就已經否定整個台灣反帝、反封建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筆者在先前的論文中已指出¹⁰，黃得時發

⁸ 鄭炯明等，〈「糞寫實主義事件」解密——訪葉石濤先生談〈給世氏的公開信〉〉，《文學台灣》42，2002年4月，頁29。

⁹ 葉石濤，〈府城之星，舊城之月——「陳夫人」及其它〉，《文學回憶錄》（台北：遠景出版社，1983年4月），頁4。

¹⁰ 陳建忠，〈發現台灣：日據到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史建構的歷史語境〉，《台灣文學評論》第1卷第1期，2001年1月7日。

表的一系列台灣文學史論述，〈晚近台灣文學運動史〉（1942年10月）、〈台灣文學史序說〉（1943年7月）這種抗拒被殖民者「消音」的文學史建構，它和反殖民文學一樣，都針對殖民主義論述對被殖民者的矮化與無視化提出解構，一個是殖民者的殖民主義史觀，另一個則是反殖民者的本土主義史觀。因此，黃得時的文學史論從發表時間上來看，剛好一方面是對島田謹二「外地文學論」的反擊，另一方面則與「糞現實主義論爭」的議題交疊，戰爭期台灣文學所面臨的艱難情境，於此可見一斑。

「糞現實主義論爭」兩邊的論爭，批判台灣現實主義文學的有：濱田隼雄，〈非文學性的感想〉，《台灣時報》（1943年4月）。西川滿，〈文藝時評〉，《文藝台灣》6：1（1943年5月1日）。葉石濤，〈給世外民的公開信〉，《興南新聞》（1943年5月17日）。其中西川滿〈文藝時評〉上的論調是「糞現實主義」一詞的由來，他露骨地批判台灣文學主流的現實主義文學說：「大體上，向來構成台灣文學主流的「狗屎現實主義」，全都是明治以降傳入日本的歐美文學的手法，這種文學，是一點也引不起喜愛櫻花的我們日本人的共鳴的。……真正的現實主義絕對不是這樣的；在本島人作家依舊關注『虐待繼子』的問題或『家族葛藤』的問題，只描寫這些陋俗的時候，下一代的本島青年早已在『勤行報國』或『志願兵』方面比現出熱烈的行動了」¹¹。

被迫回應的台灣作家及文章有：張文環，〈台灣文學雜感〉，《台灣公論》（1943年5月1日）。世外民（邱永漢？），〈狗屎現實主義與假浪漫主義〉，《興南新聞》（1943年5月10日）。雲嶺，〈寄語批評家〉，《興南新聞》（1943年5月24日）。吳新榮，〈好文章、壞文章〉，《興南新聞》（1943年5月24日）。尹東亮（楊達），〈擁護「糞現實主義」〉，《台灣文學》3：3（1943年7月31日）。《呂赫若日記》（1943年5月7日）¹²。

¹¹ 引見曾健民譯文，《噤啞的論爭》（台北：人間出版社，1999年9月），頁124。原文作「糞」，譯者依其語意譯為「狗屎」。

¹² 日記雖非公開之文本，但有助於理解當日情境，特誌於此。呂赫若在日記中提到西川滿的〈文藝時評〉，稱其為「文學陰謀活動家」。請參見呂赫若，《呂赫若日記（1942~1944）》（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年12月），頁339。

作品上的對抗則有：陳火泉，〈道〉，《文藝台灣》6：3，（1943年7月1日）。西川滿、濱田隼雄，〈關於小說「道」〉，《文藝台灣》6：3（1943年7月1日）。另一方則為呂赫若，〈柘榴〉，《台灣文學》3：3（1943年7月31日）。王昶雄，〈奔流〉，《台灣文學》3：3（1943年7月31日）。

從殖民主義史觀與本土主義史觀對抗的角度來看「冀現實主義論爭」，不難發現，殖民主義文學家會對現實主義文學如此反感，正因為現實主義文學以如實的描寫、反殖民的精神對殖民主義提出了文化的抗爭。

戰後有半世紀的時間，葉石濤在戰爭期的許多作為都被劃歸為親西川滿一派，在「冀現實主義論爭」中發表攻擊台灣作家陣營的〈給世外民的公開信〉尤為「鐵證」。近年來，葉石濤又聲稱本文當年是西川滿所寫，卻借用他的名字刊出。不過，此說之可信性因是在西川滿已逝後才發表，著實會引人爭議¹³。如果此一澄清是可信的，那麼更可看出葉石濤確實只是一名文學愛好者，他並未直接涉入到文壇與政治的權力糾葛當中。但即便對此說存疑，由前述關於兩篇小說的討論亦可看出，葉石濤戰前發表的小說，雖一味地將浪漫情愛與描寫當作文學題材，卻沒有呈現出太過脫離現實的描述，這與西川滿當時的許多作品相較，葉石濤反而是比較有「現實感」的。只不過，他尚未擁有解釋這些現實的能力罷了。

自然，做為一名皇國少年，葉石濤不是沒有呼應戰爭時局之作；不過，小說中的筆法仍有可資特別申論之處。一九四三年底，葉石濤辭去《文藝台灣》的工作，返鄉在台南市寶國民學校擔任助教。未久，一九四四年二月，《台灣藝術》上刊出葉石濤以「鄭左金」為名之小說〈黎明〉（夜明け）¹⁴，是一篇與志願兵制度有關的作品，並且獲得「懸賞小說二等入選」¹⁵。另外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也有隨筆〈美機敗逃〉描寫決戰時期皇軍驅逐美機時的興奮之情¹⁶。

¹³ 鄭炯明等，〈「冀寫實主義事件」解密——訪葉石濤先生談〈給世民的公開信〉〉，《文學台灣》42，2002年4月，頁25。及官漢生，〈台灣殖民歷史的「瘡疤」——怎樣看葉石濤最近在日本的發言〉，《左翼》27號，2002年9月30日。

¹⁴ 葉石濤，〈黎明〉（夜明け），《台灣藝術》5：2，1944年2月。今經張良澤翻譯，刊登於《台灣文學評論》2：4，2002年10月。

¹⁵ 張良澤，〈葉老的一個秘密〉，《台灣文學評論》2：4，2002年10月，頁260-261。

¹⁶ 葉石濤，〈美機敗走〉，《台灣文藝》1：6，1944年11月。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參加青年團的昆淋等一行人與劉姓地主產生了對立，劉地主所代表的乃是守舊、不配合大局的形象：「反抗舊習、反抗世俗、不斷督促自己、勉勵自己，是青年團員的本分；同時做為農民，要與苦生活戰鬥。青年們非發揮最高的力量不可」¹⁷。雖說如此，在時局色之外，其實通篇作品仍免不了情愛描寫與抒情語調，然而小說中涉及徵兵制度發布的部分，其實一直到小說結尾才突然出現，彷彿是為參與徵獎而特意加入的。

不過，小說中也出現了昆淋對於哥哥不肯辛勞務農的不滿，也在閱讀中感到「才讀了幾頁的書又覺得作者根本不懂台灣農村實情而亂寫一通」，這些情節在這篇原本短小的小說中，尚未被視為重要的段落來經營，但也可看出青年葉石濤對於農村現實的某種並不「浪漫」的思考傾向。而這些農村思考雖然是符合時局增產而產生的，卻也揭示了某些我們在觀察台灣皇民化時期作家的「關鍵點」，那就是這些因身為台灣人而具有實感的農村現實感受，它雖可以被納入戰時國家體制，卻也不能否認它是作者對於台灣殖民地現實問題的認識與認同，一旦作者思想轉變了，這些現實認同便可能發揮另外一種意義。而這點，正是我們觀察葉石濤文學從戰前到戰後這過渡時期思想變化的重要契機。

三、從浪漫抒情主義到浪漫英雄主義：左傾青年的蛻變歷程

半世紀後，葉石濤以回憶的角度說明當年所謂「光復」初期，嚮往的乃是台灣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但並不是走台獨的路。他想要好好做一個中國人，實踐三民主義的台灣人，卻遭遇到實行共產主義的陳儀。他說：

光復之初，我們想的是應該建設台灣成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台灣的確有那個條件。而實際上，這種想法亦是非常正確的，但為什麼台灣沒有成為模範省，完全是中國人搞錯了方向，不是台灣人搞錯方向。¹⁸

¹⁷ 葉石濤，〈黎明〉，《台灣文學評論》2：4，2002年10月，頁269。

¹⁸ 葉石濤，《葉石濤先生訪問記錄》，張守真訪問，（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2年12月），頁82。

但進入戰後初期，「現實」教育他的是讓他重新以左翼思想來思考「祖國」接收帶來的災難。因此他在戰後不到一年，一九四六年《中華日報》時期發表的〈偷玻璃的人〉、〈走江湖〉便已經呈現出對失業與貧窮等戰後社會問題的關注。他在接受文學史家陳芳明訪談時，便坦言四〇年代時期的知識分子流行一句話曰：「再解放」，因為國民黨的解放不算數，中共成為另一個希望所在，而他自己：「最關心的是階級對立問題。我在四〇年代所寫的作品完全是從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思考出發，將台灣人的痛苦以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觀點來寫，所寫的都是階級的矛盾。因此我在四〇年代的觀念，完全是以左派的立場來寫作的，……」¹⁹。

對戰後初期葉石濤小說中的左翼傾向，與他戰爭期小說中唯美感傷的文風甚不相合，其轉變因素又是為何？這自然是本文試圖進一步揭示的重點。在此之前，我們不妨先考察葉石濤如何跨越語言障礙，重新在戰後初期文壇出場，再進入關於作品與思想轉變問題的探討。

戰後，葉石濤重拾他的創作之筆。一九四六年起，開始在位於台南，作家龍瑛宗主編之《中華日報》日文「文藝欄」時期發表的作品有：〈偷玻璃的人〉（1946年7月11日）、〈走江湖〉（1946年10月17日）、〈幻想〉（1946年3月28日，以筆名鄧石榕發表）三篇日文小說²⁰。這些如同「街頭素描」的小說，簡單幾筆寫到竊盜、賣藝等情節，已可看到戰後不到一年時間，台灣社會經濟與治安的敗壞。

葉石濤真正的創作高峰出現在「二二八事件」後。當時，龍瑛宗、呂赫若、張文環、楊逵、朱點人等日據作家，除楊逵的鬥志仍高昂外，幾乎都因時代因素自文壇消失。但新世代的台灣作家的創作力不減，似乎沒有受到血腥鎮壓的恐嚇，反而扮演起反映時局的角色。當年，台南的文學青年頗眾，且多為葉石濤之同學

¹⁹ 李文卿記錄整理，〈文學之「葉」，煥發長青：陳芳明專訪葉石濤〉，《聯合文學》206，2001年12月，頁40。不過，訪談中葉石濤提及，他當年的閱讀並非學習毛澤東思想，而是學習他的評論文章，似乎有意區別自己與當時親共左翼的差異。此點有待日後察考。

²⁰ 其他尚有各種文類的創作與翻譯如：評論〈黛玉と寶釵〉（〈黛玉與寶釵〉）等、隨筆〈煙草に就いて〉（〈關於香煙〉）等、散文詩〈幻想〉、郭沫若詩譯作〈白髮〉。較詳細之統計可參見彭瑞金，《葉石濤評傳》（高雄：春暉出版社，1999年1月），頁116-117。

或文友，如邱媽寅、謝哲智、施金池、黃昆彬、朱有明等，至於像王育德亦時相往來²¹。在國民黨政府尚窮於應付國共內戰當時，左傾化的台灣知識分子與中國左翼文化人，共同協力在一九四七至四九年間，形成短暫的批判現實主義思潮。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青年葉石濤的小說創作成為日據以來前輩作家「隱退」、「失蹤」後，產量最多的台灣新世代作者。這時，他近九成的小說都由人中譯（包括潛生（龔書森）、林曙光、陳顯庭等人），多半發表在《新生報》「橋」副刊上，稱他為此時創作力最旺盛的小說家並不為過。其小說的發表情形，「二二八事件」後可得者有十三篇²²，分別是：

《新生報》「橋」：一九四八年發表〈河畔的悲劇〉（125期，6月9日）、〈來到台灣的唐·芬〉（132期，6月28日）、〈澎湖島的死刑〉（142期，7月21日）、〈汪昏平、貓和一個女人〉（154期，8月18日）。一九四九年發表〈三月的媽祖〉（212期，2月11日）、〈伶仃女〉（217期，2月24日）、〈天上聖母的祭典〉（222期，3月28日）。

發表在其餘報刊上的則有：

《中華日報》「海風」：一九四八年有〈復讎〉（312期，6月24日）、〈娼婦〉（316期，7月1日）。一九四九年有〈故鄉〉（388期，1月20日）。

《力行報》「新文藝」：一九四八年有〈歸鄉〉（3期，8月16-17日）。

《公論報》「文藝」：一九五〇年則發表〈莫里斯尼奧斯基的遭遇〉（6月19日、6月26日）及〈畫家洛特·萊蒙的信函〉（12月5日、12月12日）。

綜觀此時期作品，從小說的取材與主題上可大分為兩類，分別是以四百年來台灣歷史事件為背景的歷史題材小說²³，如〈河畔的悲劇〉、〈復讎〉、〈來到台灣的唐·芬〉、〈娼婦〉、〈澎湖島的死刑〉、〈天上聖母的祭典〉。

²¹ 葉石濤，《從府城到舊城：葉石濤回憶錄》（台北：翰音文化事業公司，1999年9月），頁51-52。

²² 若據筆者的考證，則彭瑞金先前統計葉石濤發表11篇之說應予更正。彭說請參見《葉石濤評傳》（高雄：春暉出版社，1999年1月），頁124、149。另外，葉石濤此時期的其他文類創作較詳細之統計亦請見彭書，頁150。

²³ 根據葉石濤所述，戰後初期他曾著有長篇小說《熱蘭遮城陷落記》，參與龍瑛宗主編之《中華日報》「日文欄」徵文，「以荷蘭時代為背景，寫了我們先民筆路藍縷以開拓台江荒野的十多萬字應募」，不過卻「意外」落選。可見，葉石濤對此一歷史問題，實有相當程度的了解與關懷。關於參獎相關問題，請參見葉石濤，〈光復前後〉，《文學回憶錄》（台北：遠景出版社，1983年4月），頁30。

另一類作品，則是以台灣當代現實為背景的現實主義小說，如〈汪昏平、貓和一個女人〉、〈三月的媽祖〉、〈伶仃女〉等皆是。

這些小說如果由文學風格來看是相當複雜的，在寫實性的歷史事件敘述當中，時時可見葉石濤早期唯美而具有異國情調的描寫手法，這使得葉氏的小說充滿著個人一貫的獨特風格，林瑞明在〈葉石濤早期小說之探討〉一文中便提到：「從創作的風格而言，亦無多大的轉變，葉石濤仍然耽於異國情趣」²⁴。但，這些「唯美風格」與「異國情趣」所占的比重卻恰與日據時期作品相反，顯示出葉石濤轉變的痕跡。

由歷史題材小說來看，葉石濤有系統的記錄台灣在不同外來統治者的治理下，不同歷史階段裡台灣人民反壓迫的故事。余昭玟在〈台灣光復對葉石濤小說主題的影響〉一文中即如此評論說：「……葉石濤有系統地記錄台灣每個統治時代，不管統治者是誰，只要是劫掠人民的，他一律加以唾棄，他在每篇小說裡歌頌人民抗爭的英勇事蹟」²⁵。關於這些以台灣歷史為背景的小說，筆者擬於下一節再專論。此處將先行探討呈現出左翼思想的另一批作品，也是葉石濤在戰後初期努力「去殖民化」而建立階級與批判觀點的具體例證。

其中，〈汪昏平、貓和一個女人〉、〈三月的媽祖〉、〈伶仃女〉三篇小說都隱約地透露出葉石濤以素樸的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站在台灣底層民眾立場來凝視現實，尋求「解放」的心願²⁶。

在〈汪昏平、貓和一個女人〉當中，身為貧農的「我」指責他大地主之子的好友汪昏平說：「你是生長在台灣，好也罷、壞也罷，我們逃不開台灣的現實社會，我們不能不與人們共同渡過喜怒哀樂的歲月，那才是我們這些動搖了的台灣智識階級所應走的路子，除此以外個人的沉淪於美的追求，就

²⁴ 林瑞明，《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6年7月），頁342。

²⁵ 余昭玟，〈台灣光復對葉石濤小說主題的影響〉，《新地》3，1990年8月5日，頁37。

²⁶ 葉石濤曾自述其思想的成分，可以用來說明他為何會以社會主義來分析台灣現實，他說：「我以前接受過馬克思主義的洗禮，所以並不屬於資產階級的胡適等人的舊自由主義，我是帶有濃厚的社會主義傾向的新自由主義者。」引文見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6月），頁49。又，余昭玟〈台灣光復對葉石濤小說主題的影響〉一文對葉氏小說中的「解放」思想有過討論，可參考，文見《新地》3，1990年8月5日，頁41-43。

是世紀末的頹廢呢！」²⁷。小說中的汪昏平顯然被塑造為一個尚未覺醒的知識階級，所以「我」以堅定的階級意識，發出對未來的期待：「耕作荒蕪地，那才是調和我現在的思想與生活的方法。從這出發點我們開始前進，然後定會有一天與農民共同解放。我相信這日子的到來。我也希望昏平有一天會來跟隨我們的道路」²⁸。

林曙光在〈評葉石濤的「進步」〉當中，對於葉石濤描寫的知識分子，給予了針對現實、反映現實、批判現實的評價，認為是思想「進步」的小說，他並說：

將來的台灣文學是不可、又不能建立在蒼白的知識份子的上面，因為這一些人，所追求的是病態的美，對社會的貧窮的群眾，頂多祇能夠同情，他們的文學或思考不是建立在社會現實之上，那麼當然談不上人民文學所要求的戰鬥性與指導性的了。

汪昏平是有代表性的。他代表著佔整個知識份子的多半的蒼白的知識份子。所以我們由這個作品，可以獲得對台灣的現實的理解。並且也可以使得蒼白的知識份子本身得到自我檢討的良好的媒介。²⁹

〈三月的媽祖〉裡，進一步寫到了「三月」的革命與槍聲，但這些革命的英雄，卻在群眾內部無法團結的情況下而被「軍隊」擊破。葉石濤描寫當時混亂的抗爭場面，人人都被捲進了時代漩渦，充滿革命的浪漫主義激情：「革命從島的北部一直像大潮般洗盡了一切，頃間便到達了N市。律夫沒有任何種的計畫，立刻便跳進那激渦裡而被排流。那時的他只能其準理論——貧乏的公式主義而判斷，然而行動的意欲確像著一匹奔馬是那麼的緊迫」³⁰。

²⁷ 〈汪昏平、貓和一個女人〉，潛生譯，《新生報》「橋」副刊，第154期，1948年8月18日。引文見《三月的媽祖》（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年6月），頁77。

²⁸ 同上註，頁88。

²⁹ 林曙光，〈評葉石濤的「進步」〉，《新生報》「橋」副刊，第161期，1948年9月8日。

³⁰ 〈三月的媽祖〉，陳顯庭譯，《新生報》「橋」副刊，第212期，1949年2月11日。引文見《三月的媽祖》（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年6月），頁89-90。

逃亡的律夫在飢餓與疲憊中，幻覺裡不斷出現「媽祖」的意象，象徵渴望被母性的慈愛撫慰與救贖。小說結尾，在被農村群眾收留後的律夫，遙想著：「大地開起花朵來了。大地屬於真正的所有者，自由和勞動的詩也屬於我們」³¹。

「媽祖」這在台灣民俗信仰中被視為「聞聲救苦」的神祇，在此則被「召喚」成為台灣人追求苦難救贖的象徵，益發顯示出青年葉石濤對於「再解放」的迫切渴望。葉瑞榕當年的評文便特別提醒讀者小說中有「靈」與「肉」兩種「媽祖」的形象，並認為這是：「由於作者主觀的心理作用構成的客觀事實的湊合，因此富有真實性」³²。畢竟，無論是革命者或群眾都必然在心理或現實層面，期待過媽祖慈輝之普照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媽祖」的「神性」原先並非普照台灣眾生。一九四三年一月左右，葉石濤就曾以〈媽祖祭〉投稿張文環主編之《台灣文學》獲選佳作，但未刊出，該作被認為是「具有浪漫性，是篇全然任性的小說」³³。此外，我們還可注意西川滿對於媽祖信仰的著迷，他不僅在一九三四年成立「媽祖書房」，創刊《媽祖》雜誌，一九三五年的詩集也稱為《媽祖祭》。這些日據時期出現在西川滿與葉石濤文學中的「媽祖」，神祇只不過是他們製造浪漫異國情調的偶像而已！必要到戰後初期，「媽祖」在重新確認自己階級立場的葉石濤筆下，顯現她對於台灣民眾的解救意義。這與葉石濤重新確認詮釋台灣史的階級立場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詳後文）。

〈伶仃女〉，則敘述一位丈夫死去的可憐女子的遭遇。小說特別標示時間為戰後寒冷的「二月」，而且其訴說對象為來自中國的楊小姐³⁴。這位伶仃女形容自己的丈夫時曾說：「在這種社會裡什麼人也與寡婦完全無二，在餓死線上掙扎著的人們，有著永不能填滿的欲望。他們連溫衣飽食的極小欲望都不能滿足，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將這憤怒轉向那一方向。」女子並說：「丈夫並不

³¹ 同上註，頁 95。

³² 葉瑞榕，〈評「三月的媽祖」〉，《台灣新生報》「橋」副刊，第 216 期，1949 年 2 月 23 日。

³³ 原出：編輯部，〈一般投稿選後感〉，《台灣文學》3：1，1943 年 1 月。此處轉引自林瑞明，〈葉石濤早期小說之探討〉，《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6 年 7 月），頁 334。

³⁴ 〈伶仃女〉，秦婦譯，《新生報》「橋」副刊，第 217 期，1949 年 2 月 24 日。引文見《三月的媽祖》（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 年 6 日），頁 97-99。

是共產主義者，且也不是十九世紀的人道主義者，他是站在經濟平等上的自由政治型態為唯一的真理的世界。……丈夫是一個可名為新自由主義的今世紀的自由主義者吧」³⁵。這段引文相當清楚地議論並標舉自己人道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傾向，而迴避共產主義者的稱號，可算是葉石濤自我定位與自我「消毒」的手法。

很顯然地，這些小說充滿了台灣人民渴望「再解放」的心聲，它的批判雖極曲折，甚至異常微弱，但不容忽略的是青年葉石濤以此來鼓舞台灣人不應放棄希望，足見葉石濤是清醒地凝視著戰後台灣的現實，並尋思屬於知識分子可以有實際作為的時機。當然，由於這些小說背後的社會主義思想給予作者認識社會，並進而企盼改造社會，從此我們亦不難窺見戰前台灣知識分子用以批判殖民統治的左翼精神的延續。

對戰後初期葉石濤小說中的左翼傾向，與他戰爭期小說中唯美感傷的文風甚不相合，其轉變因素又是為何？若根據葉石濤的自述，那應該是在他身為中學生耽讀文學與哲學時，接觸相關社會理論與馬克斯主義著作的影響，不過，在當時他顯然更愛好浪漫主義文學。他的回憶錄中提到十六、七歲時：

……後來我讀到一本書真正啟蒙了我的心眼，使我對社會和歷史的轉變過程有了清晰的概念。這本書是河上肇的《第二貧乏物語》，我得到有關唯物辯證法的基本知識。從這本書的啟示我又溯往讀了費爾巴哈和黑格爾辨別了辯證法發展的脈絡。從此之後我捨棄了所有唯心哲學，專找馬克斯、恩格斯、考茨基、羅塞·盧森堡的書來唸了。³⁶

可以這麼推論：左翼書籍在戰爭期雖則還能被閱讀，但充其量只能是以一種知識體系靜態地存在於圖書館與書齋，而無法發揮指導行動的力量。這只要從楊逵、張文環、呂赫若，乃至於龍瑛宗這些前輩作家在戰爭期的潛伏低調，便可知台灣左翼傳統正進入潛流的階段。皇國少年葉石濤雖涉獵廣泛，但也不可能越過現實與世代先天的限制，成為左翼的知識分子作家。

³⁵ 同上註，頁 106。

³⁶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年 6 月），頁 39。

但是，葉石濤戰後初期思想明顯的左傾化，則可見這絕非思想的突變，而是戰前的思想準備與戰後的政經災難結合的結論。也就因此，益發能讓我們體會由皇國少年到左翼青年的轉變過程之複雜，台灣知識分子作家的思想轉折確實有待更細膩的分析與理解³⁷。

陳傳興也指出，戰後初期的葉石濤：「棄絕耽美的形式主義，保存藝術倫理核心，此為葉石濤去殖民化揚棄西川滿所給予的殖民知識經驗過程；連帶地也跟著引生系列的思維邏輯轉換，環繞唯物史觀，其中最主要者就是突顯『階級意識』」³⁸。對此，葉石濤亦有親自說明，他對當時左翼思想的流行解釋道：

台灣人的思想受到最大的影響是 228 以後，反對國民黨，台灣人走向中共、走向社會主義。那時候像我這種二十幾歲的台灣人，百分之百都有左派思想，不一定都傾向中共，思想則都是馬克斯主義的思想。本來左派思想就是台灣知識分子的特色，龍瑛宗、呂赫若、楊逵、王詩琅等等全部都是左派作家，台灣人左派的傳統很深。戰後，台灣的年輕人，從日本時代活過來的，多少都有這種意識，雖然日本時代反共，戰後也反共，但是台灣人要求生存，必須找一條路。³⁹

筆者在另一篇論及戰後初期現實主義思潮的論文中便提出看法，認為：「真正以台灣現實問題為對象，用現實主義技巧來反應時代的，仍以台灣作家居多。他們沒有參與太多理論的建構或爭論，更是論爭中的『弱勢』（文化領導權是由大陸來台作家掌握的），但現實主義要關切的問題已然藉作品訴說無遺。相反地，來台的作家與文化人，除了少數如歐坦生會寫出較為貼近台灣民情的作品外，多數仍為在『理論』上予以『技術指導』」⁴⁰。筆者的重點在於強調，戰

³⁷ 關於戰後初期台灣作家的個案研究，已漸引起學界注意，互相參見更可發現其間的差異性。如柳書琴的龍瑛宗研究便指出，戰後一年半期間，龍瑛宗從一個民族主義者漸進為一個民主主義者，所指便是其曲折的認同道路。請參見柳書琴，〈跨時代跨語作家的戰後初體驗：龍瑛宗的現代性焦慮（1945～1947）〉，《台灣文學學報》第4期，2003年8月，頁101。

³⁸ 陳傳興，〈種族論述與階級書寫〉，楊澤主編，《從四〇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11月），頁46-47。

³⁹ 莊紫蓉，〈自己和自己格鬥的寂寞作家：專訪葉石濤〉，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網站，網址：www.twcenter.org.tw，2001年3月7日訪談。

⁴⁰ 陳建忠，〈戰後初期現實主義思潮與台灣文學場域的再構築：文學史的一個側面

後初期台灣左翼思潮乃是延續自日據左翼傳統，而非率由中國左翼人士所引介（但此處並未否定其「進步性」），其中重要的觀察指標，便在於理論之餘，能夠以左翼思想為指導，關注台灣底層人民的階級困境，批判陳儀殖民式統治的，仍然是台灣作家，無論是戰前成名之楊逵、龍瑛宗、呂赫若，或是戰後青年一代如葉石濤、「銀鈴會」成員皆然。

左翼青年葉石濤雖非真正的共產黨員，而只是一位涉獵廣博的文學愛好者，但他所採取的描述台灣社會階級矛盾的視角，終於使他走出個人性的浪漫抒情主義，走向社會性的浪漫英雄主義，一種不無過度理想與樂觀的「再解放」的革命史觀⁴¹。這使我們追索台灣日據以來左翼文學傳統時，得以在戰後初期的青年葉石濤身上找到它微弱的延續。

四、台灣固有史也：青年葉石濤歷史意識的轉折

上一節所論葉石濤在戰後初期小說中展現的左翼思想，可視為對其浪漫主義文風的一種顛覆，也是對西川滿文學影響的某種「去殖民化」。然而他這時期的創作，仍有值得繼續追問之處。那就是受殖民教化所影響下的皇國少年葉石濤，他所熟悉的乃是「萬世一系」的天皇傳統與大和民族史，他對台灣史與中國史有怎樣的認識？又如何能在戰後初期藉由回溯台灣四百年史，來達到闡釋左翼思想之「再解放」理念？這是本節試圖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台灣史學者周婉窈的研究認為，「皇民化運動」使台灣人的「中國性」減低了，戰後雖想重新認識中國，卻迎來了殘酷的鎮壓：「換句話說，台灣人這個階段的『低中國性』與新來的、集負面之『中國性』之大成的陳儀政府格格不入，

（1945-1949）》，「台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成大中文系主辦，2002年11月22-24日，頁22。

⁴¹ 在接受莊紫蓉訪問時，葉石濤一反過去聲明自己是「旁觀者」的說詞（將如「糞寫實主義事件」成為另一個公案？），提及「二二八事件」當時曾試圖搶奪國民黨軍隊的武器，顯示他也是很「勇敢」的，而非僅形諸文字。他說：「228時在台南我也去發宣傳單，差一點被抓到。我也拿槍去國軍軍營搶武器，很多人被打死。228發生之後，有一個國軍軍營駐在關廟山上的神社，有火藥庫。我們缺少武器，就召集了學生和社會人士，利用晚上走路到關廟，手上沒有武器，從山下往山上包圍。」見莊紫蓉，〈自己和自己格鬥的寂寞作家：專訪葉石濤〉，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網站，網址：www.twcenter.org.tw，2001.3.7訪談。

摩擦特大，最後終於導致『二二八』的悲劇，而翻開了台灣人與國民黨政權的歷史新頁」⁴²。而台灣人「低中國性」之形成，可以由教育過程來窺知。周婉窈的研究便指出，日本公學校的國語讀本中的台灣是沒有歷史的鄉土，去除「過去」的土地，因為歷史是民族／國家認同的重要根據，她強調：

殖民地人民的自我歷史意識，對殖民母國的國家認同構成反命題。如果要確保殖民地人民的鄉土愛能轉化為國家愛，就得去除殖民地人民的自我歷史意識，代之以殖民母國的歷史。⁴³

周婉窈相當具有實證色彩的台灣史觀點，可以呼應後殖民理論家梅米（Albert Memmi）對於殖民者藉由歷史教科書來操控思想的分析。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一書裡，他指出被殖民者的歷史往往被塗抹、扭曲：「分配給他的記憶當然不是他自己民族的記憶，傳授給他的歷史也不是自己民族的歷史」⁴⁴。

因此，我們或許可以由葉石濤這屬於日本殖民教育下最後世代的角度來思考：作為一個皇國少年，他所接受的教育並未提供他關於台灣歷史的認識，為何他能夠產生台灣史的整體概念？而作為一個左傾青年，戰後初期他又是藉著怎樣的機制去轉化原先的歷史觀與文學觀？

綜觀青年葉石濤戰後初期小說中所關注的台灣歷史，從十七世紀的荷蘭統治時期，到十八、十九世紀的清朝統治時期，降至二十世紀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時期。此外，葉石濤所關注的歷史，當然還包括前文中已談之涉及國民黨接收史。如果要略微誇大的說，葉石濤在這幾篇短篇小說裡，竟然已經跨越台灣的四百年史，從而將各時期的台灣人民反抗史加以揭露。

其中，〈河畔的悲劇〉、〈復讎〉、〈娼婦〉皆以十七世紀荷蘭人殖民台灣南部的史實為背景，描寫了一六五二年九月郭懷一⁴⁵起義抗暴的情事。

⁴²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年2月），頁74。

⁴³ 同上註，頁270。

⁴⁴ Memmi, Albert.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Trans. Howard Greenfield. 1965. Boston: Beacon Press, 1991, p.105.

⁴⁵ 郭懷一（？～1652），泉州同安人，荷蘭時代移居今台南縣永康市一代，為當地之頭人。

〈河畔的悲劇〉，由其交織戀情與革命的描寫，可看出葉石濤還留有浪漫風格的餘響，小說的主題與描寫皆相當淺顯，但仍可看出指涉的是台灣民眾抗荷的事件⁴⁶。

〈復讎〉，簡潔地描寫荷蘭人稅吏姦汙台灣農民妻子，終於引發農民的革命：「那時候不能忍著荷蘭虐政的移民們，已拿著斧子、鐵鋤、鐮刀或古老的大槍子和番人們一同向城進發。他們需要解放與自由，而他們只剩下一個方法：『以牙還牙』，一六五二年中秋月夜，以郭懷一為首領的台灣人的壯美的反抗就這時展開了」⁴⁷。

〈娼婦〉中，描繪丈夫參與郭懷一革命解放運動失敗，因而淪為娼婦的婦人秀美依然對抗暴解放懷抱信念，認為是「對丈夫唯一的追輓」。透過亦為倖存者的敘事人物何斌呼喊：「到了什麼時候，地上一切的罪惡才可以消失，沒有榨取的世界才可以到來，不法與鎖鐐，像一隻兩頭蛇，不停地纏住台灣的人民。掙脫這奴隸生活的方法，祇有一個，就是戰鬥」⁴⁸，其中也明指鄭成功為收復台灣的正義之師。

除抗荷，亦有抗清、抗日的歷史題材小說：

〈澎湖島的死刑〉，假託法國人皮耶爾·羅蒂（Pierre Loti）⁴⁹隨「密特號」到澎湖島來，目睹五位反抗清廷壓迫的青年被吊死。葉石濤用法國大革命的精神來比擬這場革命，並出借台灣老人之口說：「為了推翻異民族的統治和苛政全盤的革命便要開始了，就是在今天」⁵⁰。而〈來到台灣的唐·芬〉透過西

1650年前後，因蔗糖業不振，加上荷蘭人課稅蠻橫，遂於1652年9月7日率眾攻打普羅文遮城。當日，懷一戰死，漢人被株連者有數千人。以上參考自翁佳音撰之「郭懷一」詞條，《台灣歷史辭典》，（台北：行政院文建會，2004年5月），頁821。

⁴⁶ 〈河畔的悲劇〉，林曙光譯，《新生報》「橋」副刊，第125期，1948年6月9日。

⁴⁷ 〈復讎〉，《中華日報》「海風」副刊，第312期，1948年6月24日。引文見《三月的媽祖》（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年6月），頁43。

⁴⁸ 〈娼婦〉，《中華日報》「海風」副刊，第316期，1948年7月1日。引文見《三月的媽祖》（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年6月），頁55。

⁴⁹ 皮耶爾·羅蒂（Pierre Loti，1850~1923）為法國十九世紀末期的代表作家，《冰島漁夫》最為世人所知。葉石濤在當時亦發表雜文〈羅蒂與台灣〉於《中華日報》「海風」，1950年4月26日。戰後，另有〈皮耶爾·羅蒂與台灣〉一文，後收入《文學回憶錄》（台北：遠景出版社，1983年4月），頁193-195。

⁵⁰ 〈澎湖島的死刑〉，《新生報》「橋」副刊，第142期，1948年7月21日。引文見《三月的媽祖》（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年6月），頁62。

班牙的唐·芬之口，批判了台灣父母把女子當作財產，婚姻猶如買賣的封建體制⁵¹。

〈天上聖母的祭典〉，描寫男女主角皆為日本殖民時代的抗日分子，在押赴刑場的途中，藉台人媽祖祭典的人潮而逃脫⁵²。

綜觀這些小說，葉石濤皆以「革命」或「解放」來指稱台灣群眾的抗荷、抗清、抗日，它們雖留有許多葉石濤自文學養成階段以來的浪漫殘痕——如在革命中加入愛情事件或者革命英雄的塑造，但小說「反壓迫」的意識則不容掩藏。以左翼階級意識思考台灣現實的葉石濤，轉而詮釋台灣歷史問題時，依舊運用了左翼運動中慣用的革命、解放的觀念來定位台灣農民運動，其中必然也隱含著對台灣戰後初期同樣充滿壓迫的政治現實的批判。

陳顯庭在當年曾在看了葉氏的這些歷史題材小說後，以〈我對葉石濤小說的印象〉(1948年)一文提出評論，他的論點便在於提出這些小說的現實意義，他說其作品：

……全是屬於十七世紀台灣人對於荷蘭人的反抗的故事，而作者想要藉此表現台灣人的特有的性格及象徵台灣的過去的社會將以對現社會給予一種暗示。⁵³

這種「暗示」，如果對照台灣當時的社會、政治狀況是不無批判現實的含意的，但陳顯庭認為仍缺少啟示性，「我希望葉石濤先生能夠把題材取得自目前或不久以前的台灣現實社會。更對於台灣的舊道德和屬於舊的社會投擲覺醒的，促進步的炬火」⁵⁴。實際上，上一小節曾論及之葉石濤具有左翼傾向的小說，應該已回應了陳顯庭期待他取材台灣現實社會的願望。

彭瑞金曾對這些以不同政權更迭為歷史背景的小說論道：「葉石濤不僅利用這個時期的創作，在梳理人與土地的關係，尋找台灣大地的真正主人，他同時

⁵¹ 〈來到台灣的唐·芬〉，《新生報》「橋」副刊，第132期，1948年6月28日。

⁵² 〈天上聖母的祭典〉，林曙光譯，《新生報》「橋」副刊，第222期，1949年3月28日。

⁵³ 陳顯庭，〈我對葉石濤小說的印象〉，《新生報》「橋」副刊，第146期，1948年7月30日。

⁵⁴ 同上註。

也在爬梳台灣的歷史，釐清人民與政權的關係，找尋誰是歷史的主角」⁵⁵。對於這種歷史意識的由來，是我尤感興趣的。換言之，能夠擁有對台灣歷史長河的整體關照，復能對人民與政權之關係加以反思，其中不言可喻的是葉石濤對於台灣做為一獨立自主之「主體」的反映。歷經日本殖民統治的青年葉石濤，如何產生這種思考方式，這可能是純然由中國民族主義中心思考所無法解答的。

如同彭瑞金所論，葉石濤戰後初期的作品，顯示他對於殖民問題的思考，非僅限於日據時期，而是以整個台灣史為範疇：

總括葉氏這個時期的殖民地經驗小說，最大的特色，他獨排眾議，沒有加入取材「埋葬日本人遺毒」的行列，卻好像有意地拉長台灣人的對抗殖民統治的戰線，藉以建立台灣人的抵抗史，從而建立台灣人的精神史或稱靈魂史。⁵⁶

但如果要解答歷史意識轉變的問題，也許還要回到日據末期葉石濤與西川滿的交遊經驗來談。誠如上文中已提及的，葉石濤接受了西川滿的指導，就如同他接受日本的殖民教化般必然留下了深刻影響，但，殖民地人民的主體性是因此消失？或是依然頑強地藉由其他方式與殖民主義教化微妙地對峙？甚至有隨時加以轉化、顛覆殖民教化之意義與作用的可能？

葉石濤在戰後初期的轉變，似乎可以由西川滿的歷史小說切入來思考。究竟，歷經西川滿以及日本殖民教化後的皇國少年，在戰後初期短短數年之間，何以會擁有與西川滿同樣是書寫歷史題材卻立場迥然的現象？

戰後，西川滿並未被納入日本國文學史的「正史」中，而是隸屬於「外地文學」系譜之「異鄉的昭和文學」（川村湊語）⁵⁷。或許，日本國文學史未曾正視西川滿的文學，不僅是其文學成就高低如何的問題而已，還在於那與殖民地歷史掛勾的文本難於定位的問題。其中，西川滿書寫異鄉台灣的歷史小說，當

⁵⁵ 彭瑞金，《葉石濤評傳》（高雄：春暉出版社，1999年1月），頁137。

⁵⁶ 彭瑞金，〈不及綻放的蓓蕾——四〇年代後期的葉石濤文學〉，《驅除迷霧、找回祖靈：台灣文學論文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年5月），頁394-395。

⁵⁷ 見川村湊，《異鄉の昭和文學》，（東京：岩波書店，1990年10月）。

然是本文最為關注的作品。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間，西川滿陸續創作有〈赤崁記〉、〈雲林記〉、〈元宵記〉、〈朱氏記〉、〈稻江記〉、〈採硫記〉等作品，皆圍繞台灣歷史風土為題材⁵⁸。

此處僅以〈赤崁記〉（1940年11月）為例，說明西川滿如何「借用」台灣歷史來進行文學與政治效果的演繹。小說藉由鄭成功、陳永華家族三代的歷史，強調中國官方正史之不可信，而以江日昇《台灣外記》等民間歷史記憶為準，敷衍出具「日本血統」的鄭氏後代如何心懷「南進」雄志卻又遭害的傳奇故事⁵⁹。饒富深意的是，小說中主角瞭望延伸至安南、緬甸的遠洋時所想到的段落：

啊！祖父曾經攻下的鹿耳門紅毛砦，當孫子的自己必須從祖父所獲得的地方重新出發，在這渺茫的台灣當一個統治者，有什麼稀罕？明國的再興才是重要。把大明帝國建立在南方，對！必須跳出鹿耳門這個地方，到廣大的海上南方去。思念不忘的是童年時，聽祖母講的祖父成功義烈與勇武的故事。祖父的母親是日本人，是祖父感到得意的，而自己五尺體內，也有日本人敢於冒險的血液流著，到南方去吧。⁶⁰

可以說，小說的重點除了歷史傳奇性外，恐怕更在於歷史的政治性。如果在戰爭期總督府提倡「南進基地化」的脈絡下來閱讀這篇小說，則西川滿之歷史小說便不僅是他對台灣鄭氏王朝歷史的「作意好奇」而已，而有著「偷樑換柱」般地移轉其歷史意涵的作用。陳康芬對西川滿的觀點很適宜於引述來說明其歷史文學的殖民企圖，她認為西川滿的〈赤崁記〉：「『南進』變成了台灣自鄭氏歷史以來的神聖使命與任務，在這個歷史「內涵化」的過程，可以看出西川滿是如何站在殖民者的優勢階級，將其意識型態改寫了台灣歷史的記憶與書寫，不僅輕易地褫奪了台灣人的歷史發言權，還為日本帝國的「南進政策」與「大東亞共

⁵⁸ 這六篇小說後結集為《赤崁記》（書物展望社，1942年12月）出版，並獲得1943年台灣總督府頒發之「台灣文化獎」。關於這些作品的相關研究，可參見郭侑欣，〈憂鬱的亞熱帶：郁永河《裨海紀遊》中的台灣圖像及其衍異〉，靜宜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1年7月。

⁵⁹ 西川滿之〈赤崁記〉原發表於《文藝台灣》1：6，1940年11月20日。今參考之版本為陳千武譯，《西川滿小說集2》（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年2月），頁7-43。

⁶⁰ 同上註《西川滿小說集2》，頁33。

榮圈」的侵略野心，塑造了一個在台灣歷史的正確位置，並以此作為要求台灣成為「南進」基地的歷史道德義務，……」⁶¹。換言之，西川滿正是借用台灣史來展示其種族主義（鄭氏有日本血統）與殖民主義（帝國的南方憧憬）的幻想⁶²。

不過，另一方面，彭瑞金卻試圖論證西川滿之台灣歷史題材小說是他追求文學純度的表現，裡面沒有特殊的「個人歷史情感」，對台灣沒有「惡意」，他曾力陳：「〈赤崁記〉相當謹慎地遵守江日昇的《台灣外記》，顯示作者在寫這篇小說時，無意唐突歷史，並在小說中一再聲明自己的說法本自『外記』，可見西川滿的『小心』是要避免以自己的歷史觀點去詮釋歷史，只想把歷史屬於『美的』、『趣味的』一面呈現出來而已」⁶³。

雖然西川滿並非本文的重點，但此處仍須藉此涉及到如何「建構」、「使用」台灣歷史的問題。如同陳芳明在一篇講評稿中以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為例，提到濱田描寫日本農民在台灣移民村中的種種苦況，但如果僅僅因此詮釋說濱田在歌頌日本農民作為拓殖尖兵的歷史，那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如果只看濱田的作品，絕對看不到資本主義體制對台灣農民的欺侮與壓迫，……《南方移民村》成功地轉移了日本讀者的焦點，使他們看不到台灣人的歷史」⁶⁴。延續此種觀點，我們可以說，西川滿的歷史敘述角度，無論是耽美地僅是汲取歷史的浪漫、悲情，或有意改寫、嵌入南進國策於歷史框架中，同樣都使歷史失去了台灣主體性的向度，從而暴露他的歷史書寫乃是立基於殖民者立場所被賦予之權力的暴力書寫。在這裡，台灣歷史並不屬於台灣人。

不過換個角度看，西川滿所持有的「異國記憶」(exotic memories)，在殖民主義敘事文學中充當結構性隱喻或曰概念隱喻的，是文本中殖民者所採取的

⁶¹ 陳康芬，〈歷史記憶的置換：論西川滿〈赤崁記〉中的台灣歷史話語與神話論述〉，「第二屆文學符號學學術研討會」論文，南華大學文學所主辦，2001年4月29日，頁86。

⁶² 在阮斐娜 (Kleeman, Faye Yuan) 的論文中，亦認為：「西川滿借克臧的積極擴張主義的言行來批評克塽的死守台灣貪圖安樂的消極姿態，同時也暗諷總督府當局某些人對南進政策的消極心態」。引文見阮斐娜，〈本地文化與殖民想像：鬼怪、景觀與歷史陳述〉，柳書琴、邱貴芬主編，《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台灣文學場域》(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4月)，頁186。

⁶³ 彭瑞金，〈用力敲打出來的台灣歷史慕情：論西川滿寫〈採硫記〉〉，《驅除迷霧、找回祖靈：台灣文學論文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年5月)，頁208。

⁶⁴ 陳芳明，〈釋放囚禁的心靈：評河原功〈作家濱田隼雄の軌跡〉〉，《深山夜讀》(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1年3月)，頁111-112。

統攝俯臨的觀察角度，也即是所謂「殖民者的凝視」(the colonial gaze)。西川滿與其他殖民作家，一方面擁有「歷史發言權」的主導力量，也可能產生過不小影響。但另一方面，被殖民者在認同危機之餘，卻也可能未完全失去抵拒殖民主義話語的思考能力。換言之，我們不需將殖民與被殖民者兩方的力量如此對立的看待，並認定一強一弱乃是絕對化的權力架構。

在後殖民理論中，對於受殖者被同化的現象，有所謂「東方化的東方人」(Orientalized Orientals)的說法，他們是所謂「心智被俘者」(captive minds)。「他們的觀點充滿了智識奴役的味道和對西方的全盤依賴。被俘虜的心智並不是不具批判性；不過只有在代表西方的意味上它才具有批判性」⁶⁵。如果以台灣受日本殖民的脈絡來說，皇民化的台灣人，正是另一種「東方化的東方人」，也是「日本化的台灣人」。葉石濤的國家認同與美學品味，在某種程度上言，其實也類近於一種「被俘虜」的心靈狀態，「思想上的殖民化」(the mental colonization)。所以不僅在戰爭期的幾篇作品有著唯美、順應的傾向，由於疏離於台灣新文學傳統，戰後初期在一九四八年展開的台灣文學論爭中，他甚至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⁶⁶，可見青年葉石濤因一向置身西川滿旗下，故也對台灣新文學連動所知有限、評價偏頗⁶⁷。

但是，誠如上文中曾論及的，日本殖民教化中的同化教育，固然使得葉石濤傾向於認同殖民主義的國家論述與文學品味；不過無疑地，他也在被殖民的歷程中，因為獲得較多的由殖民者轉介的文藝觀念，訓練出能夠踏入文壇的能

⁶⁵ 齊亞烏丁·薩達爾 (Ziauddin Sarder)，馬雪峰等譯，《東方主義》(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頁136。

⁶⁶ 葉石濤，〈一九四一年以後的台灣文學〉，《新生報》「橋」副刊，第106期，1948年4月16日。

⁶⁷ 此意見，筆者首發於〈發現台灣：日據到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史建構的歷史語境〉一文中，請參見《台灣文學評論》第1卷第1期，2001年7月。又，外審意見中，有評者認為在此論戰中，葉石濤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中最弱一環，具有中國認同傾向；但本文在其歷史書寫中，卻又論定其祖國夢發生幻滅，推論不清，因而，似乎其思想轉折不應發生於戰後初期？本處的詮釋歧異點在於：如何理解青年葉石濤的中國認同傾向？我認為，對台灣文學定位不甚清楚的青年葉石濤與他將台灣文學置於中國文學框架中來看，一樣顯示了他後殖民混雜主體某種程度上缺乏歷史實感所造成的思想徵候。但他從戰後初期現實中得到啟示，從而破除祖國夢的虛幻性質，卻說明了混雜主體試圖蛻變出新的民族自我的過程，是實實在在的現實體驗，這才是理解葉石濤思想轉折的關鍵所在。

力——雖然他也因此經常被人所誤解為全然地被同化。同時，戰爭期他追隨西川滿時，對西川滿這種歷史題材小說，必然要涉及台灣史實的記載與觀點的問題，但葉石濤卻因為著迷於浪漫主義而將歷史問題擱置，遂流於風格的模仿而已，而不及於產生歷史與自身的切身反省。

需進一步思考的是，在日本殖民教育中並不教導認識台灣歷史的時代，葉石濤卻顯然對台灣史有一定的認知，雖不能肯定必然受西川滿歷史題材小說的影響，但可以推想，這些史實絕非得之於戰後的教化，而是早在日據末期便已成形。既然在日據末期葉石濤傾向於浪漫化、非現實化、歷史的平面化，則他雖通曉台灣史卻依然不能為他帶來對殖民主義的批判視野。這是殖民時代的「遺產」(heritage)，卻無法真正屬於被殖民者，因為他缺乏具有主體性的歷史意識。

一旦這種史實被「覺醒」後的葉石濤重新運用，則以他早熟的技巧，將歷史問題與現實問題並而思之，就出現了戰後初期這些特殊的台灣歷史題材小說。這不能不說是結合了殖民時代與戰後初期關於歷史與文學的衝擊後，相當重大的風格與主題轉變。換言之，葉石濤接受了殖民者的遺產，某部分心靈被「東方化」了。但藉由這些現代性的遺產，他能夠進行轉化，對台灣歷史、文學乃至於政治，提出具主體性的看法，這就形成他追對戰後初期統治問題的批判視角。

因此，當我們再把左翼精神與歷史題材小說併而觀之，我們便能同意林瑞明對葉石濤小說的評論，無論是取材歷史或當代，「寓意反抗」的精神則一：

不管描寫抗荷、抗清、抗日，或二二八事件之後的逃亡，反抗意味的增強，實則反映出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在鎮壓的年代，又不能不關心斯土。葉石濤轉移歷史背景，以抗持、抗清、抗日來發抒內心哽塞的情懷，寓意反抗……。⁶⁸

另外，葉石濤關於鄭成功王朝的肯定，亦可視為對嗜寫鄭氏王朝的西川滿某種程度的反叛。在〈娼婦〉或〈畫家洛特·萊蒙的信函〉⁶⁹中，葉石濤皆將抗荷

⁶⁸ 林瑞明，〈葉石濤早期小說之探討〉，《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6年7月），頁345。

⁶⁹ 〈畫家洛特·萊蒙的信函〉，《公論報》「文藝」，1950年12月5-13日。

後的希望寄託在鄭成功的軍隊到臨，但卻已沒有西川滿強調日本血統與南進國策的思考。不過需提醒的是，當年葉石濤的族群意識依然是以「漢族意識」為取向的，導致他未將漢族對原住民族的殖民行為加以批判⁷⁰。

讓問題回到葉石濤重新挪用台灣歷史題材的問題上來。一個被殖民者既受殖民教化，又對台灣鄉土主體力圖捍衛的現象，如果由中國民族主義觀點來看自然有所謂「奴化」或「分離主義」的嫌疑，事實上是無法被理解的⁷¹。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忘記，戰後初期的台灣人多半還是以漢民族的立場來迎接中國國民黨的接收，這點葉石濤亦沒有例外。周婉窈的研究也證實：「受日本式教育的台灣人即使以日本為國家認同的對象，多數人還是很清楚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是漢民族的後裔」⁷²。只不過，歷史的弔詭（paradox）在於，台灣人的主體性竟是先受到中國近代的敵人日本所啟蒙的，而後又轉化來對抗戰後初期的中國政權。

因此，當葉石濤不再被浪漫主義文風與皇民化思想所俘虜後，經由戰後初期祖國夢幻滅的過程，他展示了經由殖民遺產所獲致的歷史視野與文學才情，轉而將這些歷史與文學賦予「現實」（reality）的向度，也微弱地繼承了台灣日據以來左翼的傳統。這複雜而多層次的認同經驗，無疑是值得仔細思索的殖民地心靈現象，絕未能以一句「變色蟲」或「機會主義者」率爾否定其所具備的嚴肅歷史意義⁷³。

⁷⁰ 在余昭玟的論文中，她提出 1662 年鄭成功取代荷蘭政權，而「只有在他治台的時代，台灣民眾和統治者之間沒有任何摩擦，人民過著安樂的日子」，葉石濤也因此略過沒有描寫。然而余文此說顯然忽略了鄭氏王朝與台灣原住民之間的衝突，漢族作家缺乏自我批判的意識，才是葉石濤沒有描寫鄭氏王朝統治下與「台灣民眾」（原住民族）的主要原因。此說見氏著，〈葉石濤及其小說研究〉，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年 7 月，頁 112-113。另關於明鄭王朝時期如何討伐、殺戮原住民族的討論，可參見林道生，〈鄭成功治台期的原住民族政策〉，《山海文化雙月刊》11，1996 年 1 月，頁 87-89。

⁷¹ 關於台灣作家遭受奴化的質疑，可參見筆者其他論文的討論：陳建忠，〈自我殖民與「近親憎惡？」——以吳濁流小說〈波茨坦科長〉為中心看台灣戰後初期的後殖民情境〉，林柏燕主編，《吳濁流百年誕辰紀念專刊》，（新竹縣：新竹縣文化局，2000 年 12 月）。

⁷²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 年 2 月），頁 278。

⁷³ 關於葉石濤戰前戰後在文學立場與政治立場上的「多變」，論者亦每有不同立場之見解，然筆者認為否定者多半由民族主義、反殖民立場過度簡單地定位葉氏，未能適切理解殖民地現實的複雜性。文中所引述之批判觀點，請參見石家駒（陳映真），〈葉石濤：「面從腹背」還是機會主義？〉，《告別革命文學？：兩岸文論史的反思》（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台北：人間出版社，2003 年 12 月），頁 128-142。

五、混雜的後殖民主體：代結語

對於戰後初期的許多批判性的作為（如「搶槍」等），在接受莊紫蓉訪談時，葉石濤強調了這種精神乃是由於「那時日本精神很旺盛」。這段必然會引起爭議的話是這樣說的：

我們是學日本人的法治觀念，不是學他們的奴性。我們只要效法他們的守法精神，其他的不需要效法。自由民主，日本人只是嘴巴講而已，心裡面不以為然。日本人百分之百認為南京大屠殺是應該的，因為中國人是賤民，殺中國人好像殺畜生一樣。日本的右派份子，想法都差不多。我的國家是台灣，我精神的寄託是日本，心的故鄉在日本。這並不表示我是日本人。因為我所受的教育、我讀的書、我所學的藝術，都來自日本，所以我的精神思想是日本人給我的。但是我有這種認識，這是另外一回事，心的故鄉是日本，並不表示我是喜歡日本的。我承認我從日本得到很多東西，感謝它，所以我認為日本是我心靈的故鄉，因為我的心靈，大部分是日本造成的。但是我的國家是台灣，這是改變不了的。我會因為日本是我心靈的故鄉而願意做日本人嗎？打死我也不願意，我寧願做苦難的台灣人過一生才甘願。⁷⁴

這段話如果進一步解析，其理路便是：日本是給予他「精神思想」的國家，他的「心靈」大部分是日本造成的，包括對抗國府的「法治」觀念，這無疑承認了受日本殖民影響的事實，亦即殖民性與現代性的影響。問題在於，我們應該如何解讀訪談中同時也提到的，他也知道日本人的侵略心態，仍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這一表態？如果借用後殖民理論家巴巴（Homi K. Bhabha）的問題意識⁷⁵：文化與國家意識的「混雜」（hybridity），最後造就出葉石濤這樣的心靈狀態與

⁷⁴ 莊紫蓉，〈自己和自己格鬥的寂寞作家：專訪葉石濤〉，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網站，網址：www.twcenter.org.tw，2001年3月7日訪談。

⁷⁵ 相關觀點可參考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認同取向，一個「學舌」(mimicry)的殖民地之子，是被徹底地同化、異化了？還是在歷史的戲弄下，艱困地蛻變出一個新的民族自我？

與其說葉石濤是「失鄉」的台灣人，毋寧說，他是一個擁有「雙鄉」(a double home)意識的台灣人。如果歸返原鄉不是一個先驗的道德指令，那麼，台灣人的心靈之鄉只怕會是一幅流亡者的圖像⁷⁶，一如戰後的中國新移民他們擁有台灣與中國大陸這雙鄉，殖民時代的台灣人則擁有日本與台灣這雙鄉。當然，被殖民台灣的歷史毋寧更加破碎而難以被理解。這是台灣歷史造就的現實，卻也是分外需要各階級、各種族互相理解的歷史，而葉石濤所呈現的正是這殖民史上難遇之島史的艱困處境。

然而，等待葉石濤的其實還有更艱困的歷史處境。一九四九年五月，警備總部發佈「戒嚴令」；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國民黨政府遷台。進入五〇年代，一九五一年九月，葉石濤被捕，並因「檢肅匪諜條例」第九條「知匪不報」被判刑五年⁷⁷。白色恐怖下，葉石濤所身繫的微弱台灣左翼傳統，已徹底與戒嚴下的台灣知識界形成斷裂。待一九六五年當他以〈青春〉一作宣告復出時，時光已流去十四年。但我們依然認為，葉石濤文學創作與思想發展最重大的轉折，無疑便在戰後初期這段風雲變色的時代完成，其中有著台灣知識分子思索島國命運的深刻啟示，值得深思。

⁷⁶ 審查意見中，有評者提出，本文既認為葉石濤的後殖民混雜主體有「雙鄉」與「心靈流亡」的問題，似與論證其艱困地蛻變出一新的民族自我之說，有所矛盾、斷裂之處？本文的回應是：既然，本文已言其民族自我的追尋是一艱困的歷程（並非順利完成），則，無論其如何追尋，終歸必須受到日本認同、台灣認同、中國認同的干擾，因而後殖民主體之民族自我，乃呈現為混雜之認同狀態，卻又不被「絕對的」中國民族主義（者）所認同，故常面臨自我流亡或遭受批判的狀況。必要從單一的民族認同角度來理解葉石濤等人的認同狀態，則葉石濤那混雜了日本與台灣認同的民族自我當無所安頓，這正是時代遺留給我們深思的問題。

⁷⁷ 關於葉石濤入獄前後的經過，可參考余昭玟，〈葉石濤及其小說研究〉，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7月，頁15-20。